

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上)

——纪念容闳逝世七十周年

戴学稷 徐 如

容闳(1828—1912)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一个卓越的爱国华侨学者。他是我国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人。为了“改革和复兴中国”,他曾经为探索 and 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案而努力奋斗了一生。为了这一目标,他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过建议;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参加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又成为民主共和的积极赞同者,热烈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事业。由于他热爱祖国的真诚愿望,促使他在复杂的历史事变面前,能够深切感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他的思想和活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他逝世之时,正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象征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随即夭折之际。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后不久,我们特为这位爱国华侨老人撰写评传,作七十周年祭,以资纪念。

一

容闳,族名达萌,,号纯甫,原籍广东香山县,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公元1828年11月17日,诞生于香山县西南境的菠萝岛南屏乡^①。南屏乡现为南屏公社,属珠海市管辖,距离澳门只有五市里。容闳的父亲容丙炎是一个贫苦农民,平时租地三亩耕种,农闲时打捞鱼虾,母亲林氏,是一个农家妇女,在容闳出世前,已有一女、一子。

^①见南屏《容氏谱牒》(一九二九年重修)卷十五,页十九下。菠萝岛,旧称沙尾,四面环水,隔前山水与大陆相望,为泥沙冲积而成。

一家五口人，过着艰苦的生活。^①

1835年，容闳七岁时，他父亲把他送到澳门英国传教士办的一所西塾上学。鸦片战争前后，这所西塾因故停办，容闳的父亲又于1840夏秋之际病逝，“身后萧条，家无担石”。这时容闳才十二岁，由于生活所迫，他曾在附近乡镇间贩卖糖果，干过农活，以后又到澳门外国天主教士所办的印刷厂当童工。1841年，在澳门那所西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玛礼逊学校兴办后不久，容闳又被招去继续学习，享受免费待遇。这所学校以后迁到香港，容闳乃先后在澳门、香港这所外国教会学校中度过六年的小学生活。^②

容闳在玛礼逊学校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开始对西学感到兴趣。1846年冬，当该校校长美国人勃朗归国前表示可以携带数名同学同赴美国，继续进一步学习时，容闳首先报名参加。1847年1月他与同班同学黄胜、黄宽三人在外国教会和香港英商的资助下，随同勃朗自黄埔远渡重洋，登上新大陆东岸。

容闳等三人到美国后，先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相当于高中程度。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他与黄宽于1849年完成预定两年的学业，黄宽由香港英商继续支持至英国学医；容闳则依靠美国佐治亚州一妇女会之资助，于1850年考入康涅狄格州著名的耶鲁大学。大学四年期间，他主要通过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习费用，而于1854年以第一个中国人毕业于美国的大学，获得大学学士学位。

容闳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由西方国家直接培养出来的我国早期的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一。他出身于农村的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西方殖民者、外国侵略者租占或直接统治下的澳门、香港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度过的。他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所接受的一套教育，与中国社会传统的封建教育截然不同。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受过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影响而完全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培养起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思想上说照理必不可免地要带有较多的崇拜西洋物质文明的成分。然而，极为难能可贵的是：容闳却是仍然保持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他虽然不知选择与批判，接受了所谓的西方文明，但他却没有一点媚骨。他热爱自己出生的祖国。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就立下了庄严的誓愿：“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这也即是说：他毕业后要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从事最有益于祖国的事。当他在孟松学校即将毕业，因香港英国商人接济期满而又不愿按他们的要求去英国学医时，正面临着失学的严重关头，当时孟松学校所设的清寒助学金可以资送他进大学，但以毕业后充当传教士为条件。容闳感觉到这与他拯救和改造中国的志愿显然不合，虽然他是个教徒，但他不受这诱惑，宁可辍学也不肯填写这个“志愿书”。他在自传里写道：“予虽贫，自由固所有，……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在学期间，容闳虽身在海外，却心怀祖国，时刻惦念着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说：“在校肄业，常思籍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

^①据《容氏谱牒》及容闳曾孙容粹灿所提供的情况（1981年9月）。

^②据《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二章。以下所引自此书者不一一注明。

日”。“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快”，“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这样真挚地热爱祖国的感情，时时想到受难的劳苦人民大众，这是容闳后来之所以能从维新变法的积极赞同者变成武装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热心拥护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人明显不同的地方。正是在美国求学的这个时期，容闳已下定决心，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容闳这时所发下的宏愿，就是要以美国为模特儿，把中国改造成成为一个生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终身。当然，这种愿望，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办不到的，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854年秋，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这时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受到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①与贫穷落后的中国相比，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自然是个天堂，物质生活条件要优裕得多，更何况加上他家庭贫寒，在中国社会的低下地位，回到中国必然是困难重重的。面对着这个抉择，容闳不曾动摇，不受诱惑，在无法继续进入专门学院深造学习工程专业的情况下，他循着既定的目标，毅然回国，尽管他于1852年曾加入了美国籍^②，并以美国为自己的“第二祖国”，但正如他的一个美国知友特韦契耳所说的那样：“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③

二

1855年（咸丰五年）春，容闳回到了阔别了八年的祖国。这时容闳二十七岁，正是可以为祖国效力，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然而，在反动腐朽的清皇朝统治下，当时的中国对于这个受过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洋”学者，是不予承认和不欢迎的。“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④。于是满怀着报国热情的容闳不得不自谋生计。

从五十年代中期回国后到六十年代初期的七、八年间，容闳找不到合适的事做，多次被迫更换职业。他先在广州美国驻华使节伯驾（Peter Parker）^⑤那里任文书，“欲借派克（伯驾）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但当他发现这个愿望实现不了时，便自行辞职，到香港高等审判厅任翻译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学法律，可是很快地他就被

①《西学东渐记·代跋》，张叔方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据美国纽海汶镇法院“归化记录”，容闳于1852年10月30日加入美籍，转引自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页。

③④《西学东渐记·代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⑤伯驾，1855年8月16日至1857年8月25日被任为美国驻华使节（时称“外交委员”，1856年7月15日到任）。

那些香港的英籍律师所排挤而无法立足，被迫离港赴沪。到上海，他在海关翻译处任职，月薪白银七十五两，从物质待遇上讲，较之香港高等审判厅已高出不少，“即所事亦不若彼繁重可厌”，但当容闳发现海关中贿赂公行，来往商船与海关互相勾结，狼狽为奸后，“乃深恶其卑鄙，不屑为伍”而自动辞职。他在向海关英籍税务司李泰国①（H.N.Lay）提出的辞职书中就中国人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为什么反而不能同英国人享受同等权利，不能一样升任税务司的不平等待遇提出抗议。李泰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表示要给他加薪至二百两银子对他进行收买和笼络，他毫不动心，毅然辞去。他在自传中曾为此发表感慨：“噫！彼固以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重，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者耶！”从以上这几次遭遇来看，容闳虽长期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但他并没有失去中国人民的立场，而且是很爱国的。他感到中国人民与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之间有尖锐的矛盾，他对于西方列强在上海开辟租界，侵夺我“治外法权”，任意欺凌中国人的霸道行为很气愤的。他自己也两次身受凌辱，被迫起而进行自卫反抗。他不满意于西方列强在中国所享有的侵略特权，因而能弃高薪如敝屣，不受利诱，抵制收买，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与强烈的爱国情感，同时也捍卫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

此后他仍“为稻粱谋”，先后在上海英商某公司和宝顺洋行（Dent & Co）“暂借枝栖”，充任书记和公司代表到江南苏杭和长江中下游各地产茶区进行实地调查，到绍兴收购生丝，又到安徽太平县采购茶叶。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内地的民情有了实际的了解和感受。随着交游范围的扩大，他结识了不少与洋务派有较密切联系的当代科技界人士、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行买办，其中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王韬、张斯桂、曾学时、徐润等②。这些人以后对容闳参加洋务运动起了媒介作用，有的还在经济上和家庭生活上给他以较多的帮助。

这一阶段，正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候，容闳于1855年春回国之初，在广州亲眼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屠杀广东红兵起义的革命群众和无辜人民的惨状，对农民革命曾深表同情，“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他曾“几欲起而为之响应”，但却还没有决心参加。为此，他在五十年代末年到江西、湖南等产茶区进行调查和购买生茶时，很想深入到太平军统治区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因而到1860年当两个美国教士邀他同去南京访问时，他便欣然接受了。进入太平军占领区，一路上他细心观察，认为“沿途所见，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皆施以极严之军法。”在自传中，他记载

①李泰国，旧译作来君，是很不确切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泰国于1855年接替威妥玛任上海海关英籍税务司。1859年9月，两江总督何桂清撤销了上海海关的美、法籍二税务司，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此后才有总税务司的名称。容闳在上海海关任职，应在1859年前，他称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当为记忆上的差错。

②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著名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亦精于数学，与李齐名；徐寿（1818—1884）字雪村，精研数理及化学、制造；王韬（1828—1897）字仲弢，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张斯桂，字鲁生，曾国藩幕僚；曾学时，字寄圃，上海宝顺洋行办房副理；徐润（1838—1911），字润立，号雨之，广东香山，宝顺洋行买办。

道：“丹阳居民，对于太平军较有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之对于人民，亦未闻有虐遇事，相处甚得也”。遇到太平天国的官员，也“为人和蔼可亲，礼貌周至”。使他获得好感。途中，遇到戒严，美国教士欲折回上海，容闳坚持要到天京。1860年11月18日，容闳等一行四人终于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

在天京，容闳等受到干王洪仁玕的热情接见。洪仁玕对容闳极表欢迎，邀请他参加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七项建议，内容包括：（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表示“愿为马前卒”。这些建议企图通过太平天国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问题提出初步而较全面的改革方案，希望把他自己从美国所得到的学识“实行于中国”，为“谋全中国之幸福”而干一番“光明磊落之事业”。当时洪仁玕对这些建议是很重视并予以认真对待的，容闳记载道：“干王乃以予所言七事，逐条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然而太平天国当时从主观和客观条件上说，都不可能将这些建议加以实行，这些建议也只能如早一年由洪仁玕自己向洪秀全提出的《资政新篇》一样地束之高阁。对此，容闳极为失望，他辞谢了洪仁玕赠给他为“义”的官爵，离开天京。

应该说，容闳起初对太平天国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但是，“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原来他对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是很不满的，认为农民起义是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必然结果，从而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他说：“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这种同情农民革命的认识在当时无疑是很可贵的，说明容闳与同时期主张革新的魏源、冯桂芬以及稍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薛福成、马建忠、陈虬、陈炽、郑观应等人对农民革命采取敌对态度，显然有根本立场的差异，比曾经向太平天国上书过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王韬，在政治观点上也要鲜明得多。然而通过这次访问的实际接触，他却认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当然，容闳当时绝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认识与分析太平天国革命，但是他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太平天国革命所暴露出来的弱点，断言它不可能如他原来所期望的那样，把中国改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倒是正确的。有的论者因此批评容闳“轻视农民革命政权”^①，其实，如果容闳当时真的投身于太平天国革命，完全按农民阶级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要求办事，却变成了一种倒退的行为了。他与农民革命格格不相入本是很自然的。

^①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3页。

自然，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容闳对农民革命是存在着一定阶级偏见的，特别是他后来参与了洋务运动，竟推崇曾国藩，肯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绩”，把太平军叫做“夙患”，称赞“中国之得享太平，与满清政府之未被推翻，皆曾文正一人之力也。”他对捻军起义队伍更诬之为“匪”，以至于完全否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当他的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的主张在太平天国得不到实现，而受到洋务派头子曾国藩的礼聘时，他的政治立场很快地便和从官僚地主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趋于一致，充分地表现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妥协性和依附性。

1860年天京之行归来，容闳感到要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理想，必须改变途径，“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认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然而现实证明这只能是幻想。此后他继续为外国洋行采购茶叶，当茶叶经理人一个时期后辞职自营商业，在九江三年，“境况殊不恶”，但它丝毫无裨于实现他“改造中国”的抱负。

总结回国这七、八年的经历，容闳称之为“黑暗时期”，“那时他看不见实现他的计划的希望”^①。但他并没有灰心，坚持了自己“欲谋全中国之幸福”的目标，继续寻找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这期间，是在“谋食亦谋道也”，绝不放弃“达予维新中国之目的。”

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清朝统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经过与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接触后，产生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军阀集团。这一派人多是清政府中掌握军政大权的实力派，他们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守旧势力顽固派相对立，在内政与外交若干政策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在维护清朝统治秩序这一根本前提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举办了洋务“新政”。首先，他们创办军事工业，聘请洋员，购进外国机器，建设制造军火的机器局。在这种形势和需要下，正在“魂梦不忘”地寻找机会以实现其“改造中国”理想的容闳，被当时著名的算学和天文大家李善兰等推荐到曾国藩那里，帮助曾国藩筹办起洋务来。

因此，从1863年起至八十年代初，容闳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帮助洋务派办理洋务。头几年，容闳为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再度远渡重洋，跋涉于中国与新、旧大陆之间；其后，以候补同知在江苏等候补用，一度充任洋务派官僚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幕僚。旋又回上海任翻译，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最后十来年，即为实行他梦寐以求的为“改造中国”而培养人材的教育计划，率领我国由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学外国的学生远赴美国。

^①寿尔《田兔号航行记》，见《洋务运动》第八册，420页。

大约就在六十年代末年，年已四十的容闳在江苏等候补用并任丁日昌幕僚时，经过朋友的介绍，与比他小二十岁的苏州一位郑姓女子结婚，第一次组织家庭生活，他们于七十年代初开始有了一个男孩容若兰。^①

容闳之所以参加洋务运动为洋务派效劳，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他念念不忘“改造中国”的计划，而并非完全赞同于洋务派的所谓“自强求富”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他之所以应曾国藩的邀请为曾筹办的江南制造局出主意，并不辞辛劳远赴美国购买机器，主要是想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以实现他培养人材的教育计划。他在自传中说，“予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因而当他得知曾国藩这时正接受幕僚们的建议，欲“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为了“能恰合总督（曾国藩）之意见”，以便得到对于实行教育计划的支持，容闳自己说，“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时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其实，容闳对于建设机器厂的设想，与洋务派的考虑并不一致。洋务派之兴办军事工业，设立机器厂，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急需的枪炮武器弹药，而容闳的设想则为：“中国今日欲建机器厂，必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就军事工业来说，“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目的是使中国能在自立的基础上，制造出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价廉物美的机器，不至于受洋商的盘剥。二者的指导思想截然不同。正如范文澜同志早就指出的：容闳的目的是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洋务派的目的则在镇压农民革命，并无对外自卫的企图，他们走的是殖民地的道路。^②

容闳的教育计划于1867年正式提出，先是通过当时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递交的，适逢文祥丁忧而延搁，直到1870年又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合上奏，第二年轻清政府批准施行。消息传来，容闳真是喜悦与激动到了极点。他自己描写道，“竟夜开眼如夜莺，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第间”。容闳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他一直殷切地期望着：“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籍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由此可见容闳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和对祖国的热爱都达到了很深的程度。这位早期的留美学生，天真地认为只要将他的教育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就能大大地变样——由落后成为先进。

容闳教育计划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即是：分期分批地选拔和遣送少年学生到美国留学，名额暂定为二百二十人，分四期，每年一期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每期先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然后到美国留学十五年。十五年后，仍按年分期送回，挨次返华。^③

^①容梓灿（容闳的曾孙）谈话记录，（1981年9月17日于珠海市南屏公社），《容氏谱牒》卷十五，页十九、三十一。容若兰，名申，号尚书，（1872—1914）。若兰是族中排行的用名。后过继给容闳的弟弟达芽，生有三子。

^②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2年10月北京修订十版，204页。

^③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八十二页四十六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872年8月中,第一期学生三十名正式成行,在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下,清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幼童出洋肄业局”,任命陈兰彬、容闳为“肄业局”常设于美国的“洋局”的正、副委员。^①此后,这计划基本上得到实现,到1875年秋第四期三十名少年学生赴美后,预定分四期派遣的第一批一百二十名留学生都陆续在美国各类学校就读。^②

1872年8月第一期留美学习的少年三十名出发前,容闳为预先布置这些学生住宿等事,先期出发,先在新英格兰的斯普林菲尔德设立留学生办事处,作为以后分配留学生学习的中心,以后办事处迁至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城。1874年,清政府批准在哈特福德城修建了一座美观坚固的留美学生事务所办公与宿舍楼,“有楼三层,极其宏敞,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屋中有一大课堂,专备教授汉文之用。此外则有餐室一、厨房一、及学生之卧室、浴室等”。这样,由容闳倡议和主持的留美学生的派遣计划才得到了必要的物质保证。

1875年春,在上述事项完成之后,容闳在美国友人的介绍之下,于2月24日在哈特福德城与康州“名门闺秀”玛丽·路易斯·克洛(Mary Louisa Kellogg)女士结婚,克洛女士时年二十四岁,容闳已四十七岁。在这之前,容闳已在中国与苏州郑姓女子结婚,按中国当时社会的封建传统风习,这并不足为奇,但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形式上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不允许重婚,因此容闳在美国没有公开郑氏的原配身份,在他自传中,也讳莫如深。容闳在国内自然是承认郑氏与自己的夫妻关系的,南屏《容氏谱牒》中也记载了这事,但却把克洛女士与郑氏的位置颠倒了。^③

1875年12月,清政府又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西、秘三国正、副公使,这是清政府派驻这些国家的第一任公使。但是容闳对做官并不感兴趣,他把他的教育计划看作是自己的“最大事业”,是“报国之唯一政策”。他要求李鸿章转请清政府收回成命,“俾得仍为学生监督,以期始终其事”。最后,清政府答应他“以副公使而兼监督之任”,继续负责管理留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

然而,容闳苦心孤诣主持的这批留美学生并没能按原定计划在美国学习十五年以完成他们的学业。不久以后,由于新任的另一留学生监督吴嘉善(字子登)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以及国内一些封建守旧势力的联合攻击和非议,指责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1880年5月,李鸿章竟指示陈兰彬命令容闳对留学生的事情“不必多管”,而由吴嘉善“设法整顿,以一事权”^④到了1881年6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页七;《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59—160页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

②这一百二十名是指清政府公费派遣的,为此同时还有自备资斧搭附前往的,其人数约在十名之谱。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十七至二十四页。

③高宗鲁《有关容闳的史料问题》,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三期,访问容梓森、容梓灿谈话记录(1981年9月17、19日于珠海,1981年10月9日于广州);《容氏谱牒》卷十五,页十九下容闳名下记载“娶郑氏”(按郑氏即美籍夫人克洛女士,因她是花旗国籍,故书为“郑氏”)另附“副郑氏”(即容闳原配郑氏)、“寄葬上海”。

④《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二,页七(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页二十一(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

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便根据吴嘉善、陈兰彬等的意见，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为理由，经过那拉氏太后批准，下令将“幼童出洋肄业局”撤销，将派遣留美的学生一律调回。^①这时距1872年第一期学生赴美才九年，离预定第一期留学生学成归国期限十五年尚差六年。在一百二十名四期留美学生中，除中途因事故撤回及在美国病故共二十六名外^②，只有詹天佑、欧阳赓刚由耶鲁大学毕业，其余六十名尚在大学，此外则尚在中学。^③

在驻美留学事务所撤销的同一年，以陈兰彬、容闳为第一任驻美正、副公使的任命期满了，这一年（1881年）容闳回到了北京。此后不久，他在上海得知他在美国的妻子病重的消息，便急忙赴美探望，从此结束了他和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关系。几年后妻子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需要照顾，而在美国住了十多年。

综观容闳自1863年后参与洋务运动近二十年，可以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奉曾国藩之命到美国为新建的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二是向清政府建议派遣学生留美而受委任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副委员即留美学生副监督，进而被任命为第一任驻美副公使。有的同志根据这些事实认为容闳“充当了洋务派的重要走卒”，“完全投靠了洋务派”，“扮演了洋务派中重要的角色。”^④这个论断是否恰当？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如前所述，容闳“改造中国”的愿望与洋务派的洋务“新政”在指导思想和所走的道路有着原则的区别。容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而不属于洋务派；第二、容闳对于洋务派曾、李等人的依附关系如同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多数对于洋务派有着依附关系一样，他们不可能自外于封建统治阶级而独立行动，这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不能因为容闳为洋务派的“新政”服务而就认为他成了洋务派的一员；第三、容闳虽受洋务派的委任并由于洋务派和参与洋务运动的关系而充任清政府的官员，然而他与洋务派的关系是很一般的，极不密切的，举例来说，就远不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因此，不能说容闳“完全投靠了洋务派”，他根本不是洋务派，谈不上是洋务派的“重要走卒”，更算不了是洋务派的“重要角色”。

容闳最关切的事业莫过于他的教育计划。这个计划之所以半途而废归于失败，除了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外，同时还由于洋务派对容闳的不信任而不加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容闳这个计划的最后实现可能会损害他们“中学为体”的根本，将导致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后果。在清政府议论留美学生是继续下去还是撤回的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洋务派的满汉头子奕訢和李鸿章。奕訢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明确地表示“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⑤容闳企图通过他的教育计划来实现他“改

①《洋务运动》第二册，164—166页。

②《肄习西学请奖折》（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十三，页十三。

③据高宗鲁编译《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上），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二期，1979年2月号，第60页。

④王永康《容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吗？》，上海《文汇报》1963年4月4日第4版。

⑤《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65—166页。

造中国”的理想与抱负，结果成为一场黄粱美梦，最后流于幻灭，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张不可避免的悲哀结局。但是，这一计划，在中国历史上毕竟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他的这个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倡议，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破天荒第一遭，是一个创举。容闳自己认为他的这一计划如能实现，“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并不夸张。在我国长期的古代封建社会时期，我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一直到明末以前，中国在科技上的发明创造始终居于领先地位，那时不曾派遣大批人员出国留学；到了十六世纪以后，特别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技术不断革新，科技发明突飞猛进，而中国则是大大落伍了。这时封建统治者仍然闭关自守，顽固自大，不愿向外国的先进知识学习。容闳的这一倡议，使中国人能直接出国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有很重大意义的。以后他的计划虽被破坏而中断，然而经此倡导，大势所趋，派遣留学逐渐蔚为风气，七、八十年代以后至二十世纪初年，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对于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民主思想，促进爱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上，确实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留学生在近代中国各方面的影响，实非鲜浅。追本溯源，不能不令人想到派遣留学生的始倡者容闳。《近代中国留学史》的作者舒新城先生写道：“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①事实确是这样。容闳在一百多年前为“改造和复兴中国”，敢于冲击封建统治者长期延续的思想上的闭关政策，主张通过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培养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文化科技人材。我们今天，为了振兴中华，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更应反对各种形式的闭关政策，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因此，容闳的开创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们是有很大启示的，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应予肯定的。

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容闳参与洋务运动的近二十年间，他还做了别的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和提出了一些别的建议。例如：1873年，他曾奉派与秘鲁专使谈判关于华工问题，并到秘鲁向受虐待的华工进行深入的调查，直接了解到实际情况，拍下有关照片资料，以有力的证据揭穿了秘鲁人口贩子的罪恶行径，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外国人口贩者予以查禁。又如1876年他在提出教育计划的同时，还提出了三个建议，其一是组织合资汽船公司，主张“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其二是建议开采矿产，以尽地利，修筑铁路，以利交通；其三是禁止外国教会干涉中国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侵入。他认为：“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仅限于宗教范围”，指出外国传教士对于教民“几有管辖全权”，他们直接干预民间刑事诉讼，侵犯中国法律主权，要求“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此外，在1881年他自美国卸任返国后，曾上书清政府，要

（下转第38页）

^①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民国十六年九月发行，第二页。

出人的因素第一，而坚决剔除一些比较庸俗传统的动作，如“狮子生儿”之类，内容和形式还注意到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新型创造。

杂技的表演不是没有危险性的，为着避免杂技员身体生命的安全，我国杂技团尽力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如演员表演高空动作时就系上保险带。在封建社会里，杂技员为势所迫，往往要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危险节目的表演，例如汉代的走索，索下面还在地上竖起几把刀剑，走索偶一不慎，跌了下来，就会有死伤的危险。又如解放前的穿铁环（即钻圈），环内四周插满尖刀，仅容一身，表演者轻身穿过，也容易有损伤的危险。现在都废除不用了。古代戴竿（杠杆）是把竿放在额上或口齿上的。史载齐东昏侯（宝卷）“能担橦，初学担橦，每倾倒在橦者必致腕伤。其后白虎橦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南史》卷五《东昏侯本纪》）这个跨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为着追求个人的娱乐而受伤折齿，是毫不足道的。但是可以说明用齿杠竿是南北朝的杂技表演的一种形式，这对封建杂技员来说，正是一种危险的勾当。其次用额来杠竿，一则辛苦，二则危险，三则姿态难看，由于用力是稳定，扒竿的危险性又大，今天杠竿是改用肩杠，这才是合理，而且是比较保险的。杂技是一门艺术，不应以危险动作来娱乐观众。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杂技的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例如“走钢丝”的腾空筋斗，过去的绳技或走索从未达到这样的难度，除了个别的例子。又如踢碗，古已有之，但现在“高车踢碗”的节目，一个青少年演员在行动中把碗几个几个地踢头上，安然无恙，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73年沈阳杂技团访问美国，演出非常成功。据外国报导：“在演出结束时，一位满面笑容的魔术师打开一幅写着‘美中两国人民友谊万岁’的红色大横幅，全体观众立刻站起来欢呼。用“古彩戏法”来表达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杂技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美国有一个权威人士看过我们杂技表演后对我们的人说：“我看过许多外国杂技团的表演，但从来未见过象你们这样具有独特风格的奇妙的演出。你们不但在杂技演出方面是优美的，在精神面貌、作风和纪律方面也是完美的。”于此可见，我国杂技艺术经过长期改造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方兴未艾，日新月异。

（上接第12页）

求禁止鸦片输入和国内种植罂粟。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采纳和实行。在这些建议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容闳是从维护祖国和民族利益着想的，是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庄严的立场上的，字里行间渗透了他热爱自己祖国的真挚感情。当然，在这期间，他对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中国人民正义的反抗斗争也有错误认识，例如他认为1870年天津教案是由于“北方人民，类皆强悍而无识，迷信而顽固，遂因误会以酿成极大之暴动”，而没能从根本的原因来认识这次斗争。由于这个错误认识。当时他身为译员，就不可能正确处理自己与外国侵略者谈判代表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认识到清政府、曾国藩等人在处理这个事件中所采取的抑民媚外的对外屈辱妥协的方针及其对人民的危害。